



西阳杂俎

我要签名版

我要吃瓜



宋代“小报”人人爱

实际上,“新闻”这一名词是宋代才出现的。

宋代邸报,又称朝报,有严格的审查制度,称为“定本”。发报前由门下省给事中负责审核,称“判报”,审核通过后才能向地方分发。报纸发行,已然成为一种国家制度。据《宋史·刘奉世传》记载,当时的邸报是每五天出一期,先由枢密院审核,再发行四方。

邸报内容主要是皇帝的诏书、起居言行、政府的法令公报、各级臣僚的章奏疏表、省寺监司等机构的工作报告和边防驻军的战报等,也包括一些社会新闻、自然灾害信息之类。

邸报的正本只发至各级政府部门的长官,长官以外的官员和士大夫只能看到它的抄件。因此,不同阶层的人群就会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,这给民间小报提供了发展机会。小报由于没有审核制度,各类信息非常丰富,不论是朝报上明确登载的官方消息,还是坊间的传闻,民众都能在小报上一探究竟。

小报“记者”多为邸吏、使臣或中下级官员兼职,也有发行方特聘的“探官”。他们四处蹲点,通过“爆料人”搜集消息:有联络大监、官女打听后宫内幕的“内探”,有到各部探看官员受贿与否、花边新闻及任免情况的“省探”,还有到各个衙门乃至监牢调查案件进展情况的“衙探”,消息到手,立马登报。

《朝野类要》等古籍记载,小报“率有漏泄之禁,故隐而号之曰新闻”。

据南宋大文豪辛弃疾观察,小报“日书一纸”,更新很快,有些消息邸报还没来得及通传,小报就已刊登;“人情喜新而好奇,皆以小报为先”,不但吃瓜群众爱看,就连官员们都经不起诱惑,花钱买小报。

由于小报以“快”为卖点,导致其刊登内容的真实性有所欠缺,常常会刊登一些假新闻,因此宋朝政府曾经多次整顿。但由于小报信息丰富,始终发展良好,到南宋时成了临安城“四百十四行”之一,当时卖报纸的行当叫“供朝报”。



大臣敢阻止皇帝玩耍 只因有史官“撑腰”

随着朝代更迭,政府职能部门虽有各种变动,但“史官”一职始终屹立不倒,司马迁、班固等一批著名的史官,记录下了当时国家政策、重大事件、人事变迁,还包括自然天文、法律施行、经济发展、水文农作等。

“史官”虽然官位不是很大,却连皇上也忌惮。宋太祖赵匡胤就曾碰了一鼻子灰。

赵匡胤有段时间迷上了弹弓打鸟。有个大臣见了,认为赵匡胤有玩物丧志之嫌,于是,在某次皇帝玩得正起劲的时候,谎称有要事禀奏。

赵匡胤无奈放下弹弓,接见大臣。等大臣奏完事,赵匡胤更郁闷了,因为奏的是件芝麻绿豆大的平常事,哪里来的十万火急!

他质问大臣:你什么意思?大臣不怕,答道:臣以为此事再小,也比打鸟的事大。

赵匡胤怒不可遏,当场“以柱斧柄撞其口,堕两齿”。大臣没有跪地求饶,他缓缓俯下身子,捡起被打落的牙齿,藏到怀里。

赵匡胤蒙圈了,“你捡起牙齿,莫非还想当物证,到哪里去告我不成?”大臣说,“臣不能讼陛下,自有史官书之”(宋代司马光《涑水纪闻》)。虽然无权控告陛下,但自会有史官把今天的事情记载下来。

大臣敢监督皇帝,不是因为他们不怕死,而是因为他们有靠山——史官,一群随时处在事发现场且坚守如实记录的人。

而按照传统,皇帝不能翻看当代史,包括本朝、本人的一切记录。这是为了防止皇帝利用权力篡改历史。

“大唐第一记者”段成式 不少名人都曾“吃瓜”

在我国古代,最为接近现代报纸的存在是“邸报”。

早在两千多年前,西汉时期就有邸报制度,堪称报纸的起源。唐朝中期,各藩镇纷纷在京设“邸”,相当于“驻京办”。各邸负责人专门搜集朝廷信息,通过邸报将信息传达给地方官员。

比如,唐玄宗时的《开元杂报》,内容大都是朝廷要闻及皇帝的重要活动:某日,皇帝下地耕种;某日,皇帝巡游东都洛阳,下榻三乡驿的连昌宫(今宜阳县境内),还乘兴编了首小曲儿,让宫女们演奏;某日,宰相跟同僚们“廷争十刻罢”,争论了两个多小时……

邸报只给官员们看,平民百姓无权阅览,老百姓知晓的新闻事件,大都是街头巷尾口口相传得来的。

而此时,“大唐第一记者”段成式横空出世。段成式写的小说集《酉阳杂俎》,犹如一本记者观察笔记。“酉阳”即重庆酉阳县,相传山下有一穴,藏有万卷书,秦时有人避乱于此读书。

段成式出身于官宦世家,外祖父武元衡,是武则天的曾侄孙,既是大诗人也是宰相。段成式的父亲段文昌也当过宰相,是唐代著名文学家。

段成式曾在京城当官,有机会翻阅官方藏书和邸报,因此掌握了不少第一手消息。再加上他交友广泛,能挖掘到民间各行各业的秘闻,于是,他自觉地承担起了“大唐第一记者”的历史使命,在《酉阳杂俎》中记录了各种奇闻轶事、皇室秘辛、市井怪谈、神仙道佛、神奇动植物,噱头十足,叙事生动,不但老百姓爱看,历代官员、文人墨客也爱看,吴承恩、蒲松龄、鲁迅都曾“在线吃瓜”,从中挖掘写作灵感。请看如下消息:

荆州街头有个叫葛清的人,是白居易的头号忠粉,“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”,浑身文满了白居易的诗,简直体无完肤,时人称其为“白舍人行诗图”——行走的白居易诗集。段成式采访过这位奇人,问“不是此花偏爱菊”这句诗在哪儿,葛清脱掉上衣,反手一指背上某处,果然没错。

段成式叙事时,还会信誓旦旦地来上一句“亲见其说”“不得不著之”,信不信由你。

古代版记者 史官和采诗官

古人十分重视大事件的记载,因此有了史官制度。史官主要记录历史,并进行编撰。一般分为两种类型,一种专门负责记录,跟随皇帝身边或者随军出征,记录下发生的所有事情。另外一种负责编撰,将其他史官记录的事件进行二次加工,形成正式的史书。

如果说史官是“时政新闻”的记者,那么“采诗官”就是负责“民生新闻”这一块。周朝起设有采诗官一职,他们每年春秋时前往民间采风,行走各地记录,劳动者们的歌咏、疾苦、呼声都被采诗官记录编撰后带回给皇帝。正所谓“观风俗”而“知得失”,采诗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下传圣意上达民情的作用。

古代记者也蛮拼



你捡起牙齿 莫非想当物证

建隆/插画

邵飘萍一支笔 “胜抵十万军”

元、明、清三代的官报和宋代的大致相同。

明清时期,政府默许民间办报,民间办的报可选登朝廷新闻,由官方特许经营的报房发行投递,通称“京报”,其内容和邸报区别不大,偶尔也会刊登“记者”采写的社会新闻,百姓只要付钱就可订阅。而“记者”一词真正出现,是在公元1899年的《清议报》上。

民国时期,著名记者、《京报》创办人邵飘萍怀抱“新闻救国”之志,撰文反帝、反军阀,下笔如刀,文笔犀利,连冯玉祥都佩服他,赞叹“飘萍一支笔,胜抵十万军”。

官僚军阀讨厌见记者,邵飘萍却能使之不得不见、不得不谈,旁敲侧击,抢得独家新闻。

大军阀张作霖被戳中痛处,捧着30万大洋,想堵住邵飘萍的嘴。邵飘萍不为所动:“这种钱我不要,枪毙我我也不要!”

张作霖恨之入骨,枪杀了邵飘萍。38岁的邵飘萍临危不惧,哈哈大笑,从容就义。

邵飘萍曾大书“铁肩辣手”四个大字,悬于报社墙上。这种正直的报人精神,今日仍激励着新闻从业者。

(综合扬子晚报、洛阳晚报、山西青年报、北京青年报、北京晚报)